

2009年里,出色的短篇小说不及前一年多,但进步还是有,如整个文学创作一样,稳固执著地向前发展。短篇小说当然没有长篇创作红火,但质量——我说过,比长篇还是要好。这也是个有意思的现象: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创作上心思太重了不行。关于这一年的短篇小说,我想找几个观点来描述它的成绩。

短篇写什么

我讲过几次关于“写什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长篇创作解决得不好,事倍功半。而短篇情况不同,作家完全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力量就用得恰到好处。实际上,都叫小说,短篇和长篇的题材是不大相同的。长篇可以写一个时代、一伙人一生的命运、人生中的重大情感,短篇做不到,但短篇可以写生活中细小的、微妙的体验,它们却往往是长篇无暇顾及的,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写国际航班上一对邂逅男女苟且的故事。他们作案的条件很差,每人只占有狭小的空间,“伊琳娜”身边有孩子,况且,周围都是乘客。小说就是从邻座乘客的视角讲述的,旁观的角度恰好说明了两人的大胆。当然,这两人没有真正实行什么,只是发生了一些动作,女方制止了男方进一步的企图,使双方关系保持在一个度上。下飞机后,他们立刻解散了,女人奔向接站的丈夫。小说里有两个人物设置得巧妙,一个是目击者“我”,她由看不惯到后来帮助偷情者戴上礼帽;一个是女人的孩子,他手指的动作表明他对母亲的事很清楚。作者通过一起波澜不惊的事件透视出社会道德的松弛。这个事件不大容易写成长篇,长篇中两人关系必然还会有所发展,但短篇中两人可以从此再不见面,含义就大不相同了。这一年里,铁凝还有《咳嗽天鹅》《内科诊室》《风度》等发表,都属于深邃短篇旨趣的作品,创作势头仍很强劲。

范小青也善于从小地方发现短篇题材,近年来一系列小说都是这样。《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从小小的名片写起。名片是一个人的面子,用于日常交往,接名片时没有不恭敬的,但谁又能弄清这张名片事后被如何处理呢?它即使被保留下来,

总览2009年的中国电视剧,最突出的现象是献礼片的大检阅,凸显出国家语境下宏大题材的生活化、娱乐化、人性化。这标志着2009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的长足进步和重大发展。同时,不同题材的类型剧呈现出多元并举、追求创新的良好局面。电视剧总产量从2000年以后第一次下降,标志着电视剧回归的理性回归。产量回落的同时,好剧相对增多。中国电视剧开始走上精品战略的发展道路。

历史题材电视剧

2009年的历史题材电视剧,革命历史题材相对多质好,悬疑剧和古装戏说剧相对减少,古代历史正剧和神话剧量少而精,展示时代脉路的传奇剧风生水起,人文历史的风情画卷得到充分展示。

革命战争题材剧在历史真实中注重个性刻画。今年的红色历史题材剧有力地担起艺术的历史认识作用。作家王朝柱编剧的大型国庆献礼剧《解放》,以强大阵容全景呈现解放战争宏伟画卷,深具历史质感,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红色历史题材剧的思想艺术水平和审美品位。革命传奇人物剧呈现新的亮色,在题材和立意上都有所创新,塑造出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红色偶像”。以历史题材见长的作家张笑天编剧的《叶挺将军》刻画了叶挺赤胆忠心为国献身的英雄形象。作家朱苏进编剧的《我的兄弟叫顺溜》,讲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充满生活质感和幽默元素的战争故事,用一个普通士兵的成长还原了真实的历史英雄,实现了战争题材剧作中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可贵创新。此外,更为纯粹的战争剧如《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狙击手》《浴血记者》等,其个性鲜明的人物改变了传统的英雄形象,上演了一出出真实的人性、个性大戏,在现实的困境中折射出来的理想主义光辉,映照出战争的残酷与人性力量。这些剧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上塑造出新中国的英雄形象群体。

谍战剧在《潜伏》后继续走红。《潜伏》将镜头对准了默默战斗在第一线的无名英雄们。敌我难分的故事追求让这部谍战剧脱颖而出,尤其是脱离了传统的人物关系、人物定位模式,成为这一年谍战剧的新标杆。《誓言永恒》《虎胆雄心》《谍影重重之上海》《勇者无敌》《冷箭》《对手》等谍战剧引领观众叩问战争中的生命意义和民族情感。2009年谍战剧多达几十部轮番播出,但类型化过度,鱼目混珠,随着观众收视疲劳,谍战剧将不可避免地滑入低谷。

传奇剧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史意识,在电视剧艺术中一直有着不凡的体现。今年,表现民族精神的家族历史题材剧大放光彩,继2008年开年大戏《闯关东》大获成功后,表现家族迁徙史的电视剧迅速升温。今年的开年大戏《走西口》和《闯关东(中篇)》把移民题材再度推向高潮。乘《闯关东》之势播出的《闯关东(中篇)》描写了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浩然正气和闯关东人英勇抗日的壮丽篇章。这类艺术作品告诉观众一种精神,那就是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勇于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是坚忍不拔、诚信理智、兼容并包、和谐相处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瓷商》《大国医》《一代大商孟洛川》《远山》等通过“家族史”透视“社会史”,观照时代的风云变幻。明显不同以往的是,这些剧作追求对民族文化的寻根意识和爱国情怀的艺术表现,有积极意义。

名著改编和翻拍一直占据这几年电视剧创作中的一块重要阵地,具备浓厚文化底蕴的四大名著《红

短篇小说：无心插柳柳成行

□胡 平

女作家与短篇小说

也不意味着两人就相识了。作者在深究一张名片的归宿,追出一连串尴尬。老太太找王友谈老许,只是拿名片做个由头,王友帮助老太太一起回忆老许,则带了不少心虚。不管怎么说,名片越印越华丽,却没有方便于解决人与人之间沟通。这是一个真正的短篇,长篇小说中尽管也会出现一些有关名片的细节,但都不大可能像这个短篇这样挖掘出它自身的意味。

郭文斌的《清明》属于把小说“说小”到接近极致的作品,是《吉祥如意》以来五月六月故事的延续。我不知道它是否是长篇的片断,但就写法而言肯定是短篇式的,里面没有传奇,没有故事,只有经过,从姐弟俩买纸、印纸钱到上坟,经过也不是主要的,主要写他们在经过中点点滴滴的体悟。六月还很懵懂,五月对世事半知半晓,两个孩子的对话就平添出许多趣味。他们提出各种问题,很琐碎,又关于世界的一切,往往触及本质,是成年人所忽略和不及深想的,其中便激发了读者的感慨和庞杂的联想。

史铁生的《史铁生微型三章》等系列产品也是往细微中去的微观小说。像铁生这样的作家,行动受到一定局限,却有写不完的作品,功夫也在于从往小处写。说到这里,可以提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短篇小说。我们的生活中有大事也有小事,生命中有大情绪也有小情绪,其实都是需要表现的。如今普通人沉溺娱乐而懒于审美,热衷消费而疏于思想,关于精神生活,以为只要上网浏览一下重要事件即可代替读小说,其实不然,生活是需要发现的,生活的细微意味,则尤其需要出色的作家来发现,这正是短篇小说存在的主要价值。把一年里优秀的作品汇拢起来,可以看出,短篇小说家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从选角到开拍一路声势浩大地走来,它们的陆续杀青,唤醒了观众历时久远的审美记忆,也唤起观众与老版对比的收视期待。创作者亦纷纷瞄准老舍名著,《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火热再现荧屏。创作者力图挖掘出对名著的新诠释,加入了一些现代文化元素,力争让观众品出新意。新版《四世同堂》以演员阵容的新鲜组合和语言风格的变化力图取得有别于老版的收视效果。由邹静之领衔编剧、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倾城之恋》,白流苏被创作者赋予了现代女性独立自由的个性。虽然相当多剧作因创作者对原作文学审美性的注重,稳住了部分目标观众,但如何超越经典依然是创作者要继续探索的难题。

现实题材电视剧

2009年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主旋律题材数量明显增多,道德情感、社会伦理、婚姻家庭、乡村生活等得到多维呈现,体现了电视人对现实的热切审视和责任担当。

主旋律题材剧聚焦开拓与建设。首先,这部分剧作聚焦新中国开创史和变迁史。《国家行动》改编自作家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以旷世难题三峡大移民为素材,大题材与乡村的艺术处理准确到位。工业改革题材《燃烧的生命》,全面展示了煤矿企业的改革发展。表现人民大爱主题诞生的《苍天》,彰显出百姓是苍天,人间有大爱的制度。白族女作家景宜编剧的民族题材《金凤花开》,展现了民族团结共建和谐家园的生动画卷。

建设新农村依然是农村题材剧的热门话题。《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2》演绎了农村面对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不同观念的碰撞,生动塑造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作家欧阳黔森编剧的《绝地逢生》展现了我国农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喜耕田的故事2》《金色农家》《女人的村庄》《永远的田野》等旨在探索建设新农村、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和平年代的军旅题材电视剧一直是近年的热点。《在那遥远的地方》表现了圣女峰上的军人力量和高尚情怀。由作家吕雷、邓刚加盟编剧的《中国维和警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不一样的警察故事。《沧海》《鹰隼大队》《新世纪兵兵》《和平使命》《潮起两江》《军旗飘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展现了新中国、新时期的军人风貌,体现了和平年代军人的价值和高尚情怀。

都市题材剧宣扬亲情伦理和情感回归。今年的此类电视剧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爱情婚姻观念的变化。《咱爸咱妈60年》《相伴》《灯火黄昏》表现了主人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传奇人生,阐发了岁月积淀的情感之美。根据作家东西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反映出现代人缺少沟通的生活本相,根据作家张欣小说《依然是你》改编而成的《嫁衣》,涉及自闭症儿童和边缘人群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今生欠你一个拥抱》《人到中年》《家有公婆》《保姆妈妈》《你永远不能独行》等观照了各种伦理关系中情感的多面演绎。由严歌苓小说改编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明星汇聚,受到众多关注。

台湾女作家林佩芬编剧的《故梦》聚焦故土情怀,表达了海峡两岸割不断血肉之情。继几年前的《再见阿郎》热播,作为前传的《又见阿郎》以两岸直航为题材,以主人公传奇波折的一生讲述了几个家庭的恩怨悲欢。

今年的电视剧中还有一批怀旧之作。如《北风那个吹》,成为“知青伤痕文学”以来电视剧文学史上第一部全新力作。这类电视剧作品规避了以往同类作品伤痛的、悲凉的反思基调,而是用充满戏剧性和浪漫情怀的情感故事记叙着上世纪的那段青春岁月。此类剧作还有《王贵与安娜》《幸福有多远》《我们的八十年代》《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让观众从那人那地那简单而朴实的生活、工作、情感,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中了解父辈的理想,获得些许情感的回归。

还有一类现实题材剧关注对民众心声的真切表达。《我是老板》成为深陷困境的现代人的精神写照。《房奴》《蜗居》均是由住房危机所引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危机和困惑。《我是一棵小草》《大生活》《三七撞上二十一》等剧作让我们在小事物的身上看到了真、善、美的永恒魅力。

本版责编：刘秀娟

·文学批评·

解,无不潜藏着深刻的、动人心魄的戏剧性。

女作家、除少数女作家外,天生是情感动物,而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说到底是人类情感的符号,这种契合,也使得女作家在短篇创作领域,格外得到发挥。短篇小说是情感的还是认识的呢?我觉得认识只能隐藏在情感中,作家的功力首先在于情感的完形。

动物与人类

由人道主义本位走向更开阔的世界观,当是目前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类价值取向,明显的征候之一,是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增加。这不是简单的题材问题,其中蕴含环境意识的觉醒,也寄托着对人际关系的反思。

除童话作品外,大量小说作品中动物被赋予人类之爱的关注,作为生灵,它们才是良善的,甚至不乏理想色彩。恰若《桃花渡》里对猫的说法:“在它身上我看到了比人更多的优秀品质。这个世界的人不能被真心爱恋,因为人的心太复杂。但是你尽管放心去迷恋动物或者植物。我爱动物和植物。”张伟的《阿雅的故事》里,不知名的小动物阿雅不断地寻找和叨来金粒,受到人们的宠爱。后来,黄色的金粒找不到了,它叨来白色的金粒,人们便厌弃和憎恶了它,置它于死地。作品带有寓言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动物的忠诚与人类的贪婪与冷酷作了对比。邓一光的《热爱一只狗》里,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小东西”的到来使老爷子摆脱了寂寞,改善了心境,也使子女们松了一口气,但接着它被宠坏,又使老爷子不堪重负,故事的结局,是老爷子与小东西同归于尽,悲剧的制造者,却与儿子和女儿无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动物故事中寻找激情的创作,将来还会更多一些,这不仅因为人类开始更多地与动物相处,也因为人们在感情上开始更多地依赖动物。

品位的成熟

短篇小说的品位的确在不断成熟,比较起30年前的短篇小说,现在的作品不但在语言和叙述上老到许多,内涵上也明显要丰富许多。

长篇小说：如何融通时代与内心世界

□岳 雯

关注度最高的小

纵观2009年的长篇小说,作家们关注现实、关注生活,“时代生活”在长篇小说的书写中突出、膨胀、铺天盖地。然而,这“生活”又是惊人地一致,单向度的“时代”在一再的书写中消除魅性,在喧闹、反复的言说中,有丰富心灵和内省精神的“人”开始退场。

本年度,刘震云完成了《一句顶一万句》,重新回到“河南延津”的立场,实现了自身写作又一次转型,受到广泛关注。在评论家看来,《一句顶一万句》“向我们习惯的小说思维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么,这部小说究竟要表达什么?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成为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孤独,在文学世界里并不罕见,杨百顺们的孤独还是要寻找一句话,“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摸着那么一个他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他想找那么一句话,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这就是刘震云所谓的“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也就是说,“说话”成了小说的核心内容,没有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方法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方面。小说采用了拟话本的形式,仿佛有一个叙事者/说书人控制着话语的走向。小说语言洗练,从容不迫,又缠绕回环。刘震云大量采用了“不是……也不是……而是……”的句式,形成了一咏三叹、回环往复的语言效果。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语言实验,也有人表示不满。孰是孰非,《一句顶一万句》将会接受文学史的考验。

今年,海外华文文学正在引起主流文学界的关注。《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了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又在第12期推出了“新海外作家专号”。《金山》具有史诗性的架构,从广东省开平县和安乡自她村写到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从同治十一年写到了公元2004年,通过方氏家族的盛衰流变,写出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坎坷历史和血泪人生。有评论家指出《金山》对于当代文学的两点重要价值:一是题材价值,这部小说将成为华人移民史题材上绕不过去的存在;二是方法论价值,张翎用看似朴拙的方法再次复活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莫言的新作《蛙》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蛙》以“姑姑”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中国实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在小说中,“姑姑”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她是一名妇科医生,有精湛的医术和医者之心,在与“老婆婆”的斗争中拯救了许多婴儿的性命。然而,她又 является计划生育政策坚定的执行者,残害了多少没来到世间的婴儿的性命。救人与害人在“姑姑”身上激烈冲突,勾勒了她传奇的一生。“蛙”和“娃”的关联,构成了小说的意味内核。小说由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以及由这五封信引出的五段小说构成,最后一部分是一部戏剧,几部分构成了互文的关系,开拓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西藏，西藏

关于西藏的书写,是当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题材高地。至今仍有神秘感的西藏地理与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叙述与想象的自由。

范稳的《大地雅歌》延续了《水乳大地》《悲悯大地》的风格,显示出了长篇小说在厚重上所能达到的限度。宁肯的《日光之城》是一部精神之作。青年哲学教师王摩诘从生物学走向哲学,马丁格从生物学走向宗教,马丁格的父亲弗朗西斯科老头,一位怀疑论哲学家,到了西藏,与儿子进行的对话深邃而迷人,这一切与西藏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这样的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与这片土地是契合的。从形式上看,他创造性地将学术体例引入到小说创作中。譬如,遍布行文间或长或短的注释,大大开拓了小说的容量。注释的出现,使小说的结构和叙述复杂而富于变化,形成一种层叠式的结构。后面部分对前面部分的重复叙述,不仅不冗余,反而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以格萨尔王传说为蓝本,以个性的语言和叙述方式重述了格萨尔王传说。作为“重述”的文本,阿来赋予了这部小说新的元素。第一,他采用了两条线索交叉推进,过去、现在、未来三条时空线索交织在一起。第二,他将格萨尔王这位战神一般无敌的君王形象还原成肉身之人。这位传说中的天神,也会为了人间的生老病死而感到痛苦,会因为胜利感到虚空,会时时觉得厌倦,为人间心魔的不断滋生而觉得无能为力。在格萨尔王的感喟中,人生的空茫感扑面而来,小说的世界因此深邃而迷人。

为浩大的“时代”作证

瞬息万变的时代,给生活其中的每个人提出着问题。200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证明,浩大而零乱的“时代”在长篇小说中取得了根本的胜利。我们能从长篇小说里感受到这个时代丰富的侧面,以及作家们对于这个时代复杂的感受。

周梅森的《梦想与疯狂》讲述了资本时代的“三剑客”的传奇之旅,描绘了资本人格在现代中国的大舞台上孕育自我、展示自我

2010.2.12. (星期五)

邱华栋的《艾多斯》,无疑为颇有品位之作。语言舒展而凝练,有些地方鞭辟入里。小说主人公是个曾经沧海的大老板,却在阿尔泰山一面草坡上被旧友无意中遇到。他已成了牧羊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艾多斯,意即“月亮的朋友”。他厌倦了在北京黄金地带炒房拿地的生活,陶醉在北疆能够望见一轮清月的生活。还在写诗,却不发表了。他到底是在躲避风险,还是终于寻找到生活真谛呢?很是耐人寻味。季栋梁的《吼夜》,写喂奶女人与丈夫、与丈夫曾经的朋友相处的生活。丈夫和他曾经的朋友之间有过节,但不很严重;女人似乎起到了调解作用,却又不明显。那朋友似乎对她有好感,但说不清是什么性质;丈夫似乎有妒意,又看不出太多。比较起传统小说惯于将矛盾冲突推向极致,使一切都水落石出的方式,明显温和或深沉了许多。重要的是,这里面有真生活的常态,有一种淡淡的、无以名状的、雍容的气质。何玉茹的《三个清洁工》取材别致,写村里三个清洁女工议论村上的大事,这些事情本来不是该她们议论的,但她们也在关心,透示出时代的变化和青年农民视界的提升。小说的好处,在于不经意处的切入和对生活底色的把握。徐岩是一位近年来短篇创作数量甚多的作家,越写越好,今年的《鼠浪岛》更趋于精美。故事是老故事,关于一对彼此相爱却又相隔重重障碍的男女,但作者将所述不疾不徐,娓娓动听,将情境氛围渲染得扑朔迷离。女疯婆的反复出入穿插,更显示出作者熟练的叙事技巧。

其它,如王蒙的《寂寂的花园》,韩少功的《生气》,红柯的《好人难寻》,储福金的《莲瓣》,陈世旭的《立冬立春》,杨少衡的《轮盘赌》,温亚军的《嫁女》,陆贻墨的《海军往事》,荆永鸣的《坐席》,晓苏的《粉丝》,次仁罗布的《阿米日嘎》,邵丽的《迷离》,曹营营的《蘑菇好滋味》,萧笛的《老毕的艺术人生》等,也是品位较佳的作品,不必一一归类概述。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当前的短篇小说,是优雅的、考究的,可评可点的,保持了纯文学的品质,不容易。当然,在这个时代,纯文学读者不会很多,但这不是问题。真正的短篇小说家,是不需要太多考虑读者的,艺术自有它自身的考虑。

的过程,元气充沛,姿态凶猛。无独有偶,王刚也将视线对准了社会转型时期资本的原罪、艰难和顽强。《福布斯咒语》讲述了地产商冯石的欲望与焦虑。他对金钱有着极度的渴望和贪婪,在光鲜的外表后面,是极度的焦虑。王跃文的《苍黄》在中国基层政治层面展开叙事。有人认为,“《苍黄》是一部关于‘怕’的小说。这些‘怕’,是我们人性中更为细弱的部分。回到‘人’,回到纷繁复杂世界中人性的纠结是王跃文对‘官场’题材小说的正本清源,也是对它的贡献”。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给了长篇小说以新的题材,但也给出了巨大的难题。有评论家认为,面对新的内容,比如新兴的富人阶层,作家们还只是匆忙的记录者,还来不及从容审视,难免让读者误以为他们欣赏物质财富对精神世界的冲击,引来争议。相比之下,对于底层世界的书写,自2005年以来已然蔚为大观。王十月的《无碑》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代打工者在历史巨轮下辗转的声音。王十月选择了李保云,这个有着一脸胎记、被歧视性地称作“老乌”的人作为标本,剖析了打工者所承担的汗水与血泪,以及他所面临的种种生活疑难。同样是写底层小人物,刘醒龙的《天行者》将一群行将被我们遗忘的人群——农村民办教师推到文学的前台。十多年前,刘醒龙以一曲《凤凰琴》,唱响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却又抵挡不了强大命运的悲歌。今年,刘醒龙续写《凤凰琴》,围绕界岭小学几位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将民办教师的生活困境与复杂的内心际遇一一展开。刘醒龙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展示“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他也将确将这群无名英雄的形象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如果说,这些小说都选取了当代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加以描绘,王小鹰的《长街行》则跨越了30年的时光,将小街上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生活轨迹同大上海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是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历史变迁的风情画卷,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独特文化的艺术展现。在丰盈的日常生活细节基础上,王小鹰写出了真实的善良的人,温润、优雅。

寻找迷失的“自我”

我们为外面的世界目眩神移,然而,关于自己,我们又知道多少。本年度,一部分小说致力于探讨“我”在这个世界的遭遇。人的孤独与脆弱、人的欲望与恐惧、人的爱与死、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长篇小说不能回避的重要命题。

苏童的《河岸》是一部发现“我是谁”的小说。在《河岸》里,人的身份变得游移不定。库文轩曾经被认定是革命先烈邓少香的儿子,这个由光辉灿烂的革命叙事背景构筑而成的家庭拥有令人艳羡的一切,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调查组的进入而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库文轩带领儿子库东亮从岸上撤退,自我放逐,开始了河上的生活。特定历史时期人的荒诞命运早在少年的视角里暗暗开始了。《河岸》的主题是含混不明的。有人认为,“《河岸》集合了苏童小说的各种可能性,无论是对于历史的个人解读、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还是对于少年青春期特有的孤独与困惑的描述、对于人生变幻的唏嘘,《河岸》以它极其丰富的内蕴和极其混杂的面目,超越了以往苏童小说单一的解释角度”。

一些作家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找人的存在本质。虹影的《好儿女花》在母亲、我、女儿的关系中发现生命的秘密。她勇敢地面对亲人的不堪与羞耻,面对自己的隐私与秘密,也就是面对人性深处的黑暗。文伟的《风和日丽》则将杨小翼的命运置于她和父亲的关系中来理解。从误认、寻父、审父到最终与父亲达到精神上的和解,她终于认识到,她在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取消过“父亲”的形象,这形象一直以某种方式作用在她的精神深处,成为她潜意识的依靠。一代人在对血缘伦理的追问中完成自身的成长,并实现了对革命化历史的认同。于晓丹的《1980年代的情人》也将目光定格在那个在讲述中不断被诗化的80年代。小说通过正文的视角,叙述了毛榛与正文、正武与老师的爱情故事,展示了那个年代的情感故事。李东华的《桃花鱼》通过对两代人的婚恋描写,表达了作家对爱情、婚姻的思考。

翻阅2009年的长篇小说,我看到了作家临摹生活的热情与努力。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炫彩流动的一面,看到欲望如何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心灵,看到流畅的、光滑的叙事使艺术难度大幅度降低。然而,有着鲜活个性与丰富心灵的“人”却消失不见。我们看到的,多是类型化的人。当作家们脱离了各种各样人的活动去表现时代的面目时,这“时代”又将是多么苍白与不堪一击。

盘点2009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协办